

中国倡廉反贪 史鉴事典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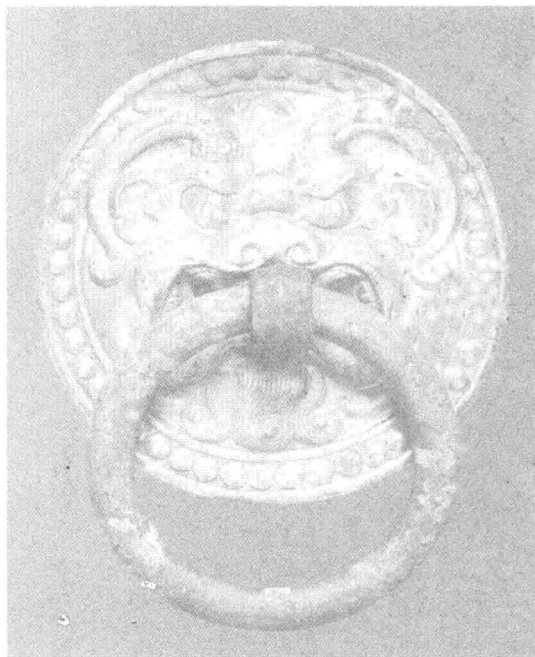
——
唐太宗

四川辞书出版社



主编 黄惠贤 金成礼

中国倡廉反贪史鉴事典



主编 黄惠贤 金成礼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7 • 成都

中国倡廉反贪史鉴事典

责任编辑 诸定耕

封面设计 文小牛

版面设计 王 跃

责任出版 赵蓉辉

出版发行 四川辞书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印 刷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

版 次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22.25 字数 520千字

定 价 35.00元

ISBN 7-80543-607-X/K·7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廉洁清正之为美德，贪污腐败之为邪恶，从来就是在统治者当中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最主要标志。人民拥护君子，呼唤廉洁清正；痛恨小人，唾弃贪污腐败。但历史的悲剧在于：人民拥护的呼之难来；痛恨的斥之难去。北宋苏辙写过一封上哲宗帝的《乞分别邪正劄子》文中说：

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

宋哲宗算不上昏君，哲宗朝也不是乱世，尚且君子道消，小人道长。遇到季世、乱世，政权的腐败，人民的苦难更不堪设想了。

1993年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励精图治的皇帝，清正廉洁的官吏，但历代统治阶级根本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剥削阶级从本质上是同人民根本对立的，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同政权腐败分不开的。

是的,历史上一些明君贤相,确曾为廉政反贪绞尽脑汁,设计并实行过许多办法。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君主躬自节俭,以为百官和后世子孙垂范。考之历史文献,尧帝、舜帝不仅布衣粗食,并以天下让贤,他们的廉洁无私是不容怀疑的了。夏禹治水,劳身焦思,薄衣食,卑宫室,奔波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浚沟渠水致之川,决九川水致四海;尔后扶持农桑,身教被天下。他们就成为我国后世君主的典范。汉代创业之主刘邦,原本酒色之徒,在他以沛公身分率兵攻取秦都咸阳时,却不取秦宫之美女财宝而退居霸上以让项羽;及就帝位迁都长安,遣丞相萧何营建宫殿,刘邦见到宫殿壮丽,怒责萧何说:“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后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皆遵其遗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尤其是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身衣皂绋,所宠幸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帷帐无纹绣,以瓦器治皇陵,不以金银铜锡为饰。景帝遵其业,是以汉兴五六十年间,生息滋殖,海内殷富,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为后之武帝的文治武功,延续二千多年、多民族融为一体的大一统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后唐宗宋祖、明清开国和守成之君大抵皆遵循这个模式,相继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几次短暂的“太平盛世”。

二是强化教化,表彰树立典型。早在《尚书·皋陶谟》中,舜帝开始分职设官,委伯夷为司教化的秩宗,更勉励伯夷:“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孔氏传:“夙,早也。言早(昼)夜敬思其职,典礼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又载,在此以前,舜帝与禹、伯夷、皋陶等议政,皋陶就提出“简而廉”是官吏的九德之一,只要“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便可做到百吏肃谨。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托名管仲之《管子·牧民》进一步把九德合为礼、义、廉、耻四德,称为“国之四维”,说是“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廉德提高到关系国

家兴衰的重要程度。什么道理呢？文中说，因为“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自全”。有廉德的人能够不为恶所蔽，是智是明，他的行为自然就清正了。汉代以全国各州郡举孝廉为朝廷荐拔人才，其中有的官至九卿，就是这个道理。

历代贤明的君主在强化教化的同时，还注意表彰树立廉洁清正之士以为百官楷模。如春秋时晋国的介子推，遭国难，奉公子重耳流亡国外达十九年之久，受尽千辛万苦。当重耳返国继立，是为与齐桓公齐名的晋文公。因国乱方平，百废待兴，赏从亡者及功臣时漏赏介子推。介子推认为文公遭大难而终得继立，是天不灭晋，耻于贪天之功以为己求禄，便携其母出隐于绵上山中。文公寻求不得，深自痛悔，遂封绵上山造林以为介子推封地，号曰“介山”。文公对群臣说：“以记吾过，且旌善人。”又如楚国的孙叔敖，三为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致霸（春秋五霸之一）。他一生尽忠守廉，庄王数赐其封地皆辞谢不受，也不让其子以荫受官。死后家贫无立锥之地，其子靠卖柴以维持生计。遇乐人优孟，优孟不平，以“廉吏不足为”讽庄王。庄王愧谢，召孙叔敖子封四百户，以奉叔敖之祀。

三是设立监察机构和其他言官，以纠举百官不法，补皇帝之失。如汉代在御史大夫之下设御史台（兰台），又在郎中令下设中大夫、太中大夫等言官。他们的官阶不高，俸禄不厚，但有为的君主很重视这个职务，多选派学识深厚、德行高洁的人充任，号为“清要”，百官敬惮。如汉武帝时的中大夫汲黯，好学，性倨，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武帝之颜色。帝虽不乐，但以他是“社稷之臣”，敬礼甚恭。史载：“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公孙）弘燕见，上或时不冠。”但是，“至如（汲）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汉武帝可不是他祖父文帝那种谦恭仁爱的皇帝，而是胆识过人、敢想敢为

的一代英主，视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卫青、声名藉藉的丞相公孙弘如小儿，而在汲黯面前，仅仅是自己的衣冠不整，就如犯了错误的蒙童对待严师，避不敢见，是什么道理呢？详诸情理，只能是他有意在群臣面前做出敬畏敢于犯颜直谏的言事官的姿态，使群臣有所忌惮，达到朝政整肃的目的。他不是称大将军、丞相，而称中大夫汲黯为“社稷之臣”，说汲黯才是支撑社稷大厦的顶梁柱，就是明证。数百年后，唐太宗敬畏谏议大夫魏徵胜过贤相房玄龄、杜如晦，演的也是汉武与汲黯的故事。不过魏徵经国之才超过汲黯，太宗容人之器也大于武帝，所以魏徵任谏议大夫不久便数升迁至侍中，居相位了。

四是制订刑律，惩治贪污腐败分子。据《尚书·舜典》记载，早在尧帝命舜摄政时，舜作五刑“窜三苗于三危”。三苗是何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舜要判他流放到极荒远的三危去？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三苗是缙云氏的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谓之饕餮。”为什么人民叫他“饕餮”呢？杜预注谓：“贪财曰饕，贪食曰餮。”看来这个君临一诸侯国之三苗是一个贪得无厌，不择手段聚敛财富，为害人民的贪污腐败分子，尧舜决定惩处他是他自己罪有应得的。唐宋以后，各种惩治腐败的律令愈来愈严密，受惩处的腐败分子，上至丞相，下至县吏，比比皆是。清乾隆晚期的和珅，以其机巧圆滑，办事称能，阿谀逢迎讨得乾隆帝欢心，官至协办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并先后兼领许多要职，权倾内外，遂贪赃枉法，聚家资至朝廷岁入之数倍。但终未逃出伏法受诛、人亡财空的可耻结局。

但是，不管人民如何呼唤、明君贤相如何提倡廉洁，人民如何痛恨、明君贤相如何严惩腐败，廉洁却如良种须要精心培育，腐败

则似莠稗难于芟除。综观中国历史,出现几次比较廉明的盛世都比较短暂,而污浊黑暗的腐败政治则漫长得多,直到历代王朝的覆灭。政治腐败的恶果,不仅使当时人民遭受苦难,而且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根源。明清两代中叶以后和中华民国期间,就因为政权腐败,阻碍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步伐,把一个经济、文化本来比西方先进得多的巍巍中华,弄得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乃至沦为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可悲境地。

由此可见,历史上倡廉反贪的经验固然宝贵,应该借鉴,但更为重要的,还应从社会历史的深层次去探索标、本同治的方略。

二

隋唐时期的思想家王通在《中说·事君篇》中说过:“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王通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厚古薄今。只要我们认定他指的“古”是三代以前的远古,他指的“今”是三代以后,特别是东汉末到隋之覆灭这数百年极为污浊险恶的现实社会;知道他的思想根源来自《礼记·礼运》,我们就不难理解到王通这两句话的深刻意蕴。

《礼记·礼运》引孔子话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是被思想家们美化了的远古社会,大概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写照吧?那时无私产就无私心,为民众办事的“从仕者养人”不是很自然的么!

《礼运》接上文又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以正君臣,以笃父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

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法）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这就是说，人类社会产生了阶级和奴隶制度，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已成陈迹。自禹建夏以“天下为家”，把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了一家一姓的天下，“货力为己”，人们各聚私产，有私产便有私心，当然就“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王通所说“今之从仕者养己”不就是铁的历史事实么！

人人为己谋求货力，欲望无穷，而货力有限，社会便分出富贵和贫贱来，除了被剥夺一切权利的奴隶以外，又分出天子、卿（诸侯）、大夫、士和黎民若干等级。他们之间也必为己谋取货力而争，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呢？于是在三代之世出现了禹汤等六君子“谨于礼”。礼是用来维护以氏族为中心的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的，也是用来“以正君臣，以笃父子……”的。这六君子谨遵不懈，信义仁让昭明于天下，“示民有常”。民众都认识到社会理当如此了，于是出现了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夫妇和睦，四邻友善相处的“小康”局面。

但是，上千年的三代历史进程，仅仅出现了禹汤等六君子，而平庸甚至昏暴如桀纣的君主却多得多。小康局面也就维持不久，而污浊腐败的政权相对要长得多。到了孔子时代，发展到诸侯力征，战火不熄，人欲横流，礼乐崩坏的长期混乱局面。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为思想家的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仁道（《论语·颜渊》）。

什么是仁？为什么说仁能克己复礼？《论语·雍也》中有一段孔子答子贡问作了回答：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

方也已。”

一切从广大民众利益出发，是很伟大的大道，从尧舜时代开始就作不到了。所谓仁，是社会发展到“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以后，人们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只是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考虑民众的利益，帮助民众，即“立人”、“达人”。

要“立人”、“达人”，首先要有爱心，就是孔子答樊迟问时说的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其次，必须根据自己对社会所作的贡献而获取应得的报酬，所谓“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才不会给民众造成伤害。

如果统治者人人行仁道，爱护民众，克制私欲，各守本分，不是可以实现社会的安定融和，恢复三代出现过的小康局面么？

孔子认为，乐富贵而恶贫贱，是现实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心态，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志于仁道的人来说，应该安贫乐道。他在《论语·里仁》中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所以，他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批评子路遇穷有怨言：“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最高的道德范畴。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择不处仁，焉得智？”（《论语·里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同上）仁比生命还要贵重，他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存仁。”（《论语·卫灵公》）

因此，人生的价值就是终身不逾地学习掌握和实行仁道。孔

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三

综观人类历史，任何思想家所主张的道德观不仅受其所处历史社会条件约束，而且也为其所选择或追求的政治制度服务，道德观和政治观是紧密相联的。孔子的最高道德范畴是仁，他的施政纲领就是行仁政。

所谓政治，说到底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国君和其臣僚与广大民众的关系问题。在孔子整理的《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舜帝和禹、契等人讨论的意见是：“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国君是奉天命设立的。而天之所以命你当国君，分职设官，目的是要这些百官辅佐你“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厚生维和”，即爱护养育天下民众，修明政治，使天下民众生活得美满谐和。《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又说：“民为邦本，民固邦宁。”《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记载师旷说：“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君为民而立，民为国之本，这是皇天之命，即天道。施仁政就是行天道。统治者如果顺天命行仁道，爱护养育民众，就能长治久安。反之，如果凌暴残害民众，就“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你弄得国家残破，社稷倾覆，就自认倒霉吧！祷告祈求都是无济于事的。

子思和孟子根据孔子“求仁而得仁”（《论语·述而》）的思路，把天命、天道和人性联系起来，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这是因为人性本善，而丧失善良本性则异化为非人：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

下(《孟子·告子》)。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同上)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

可见，人是天生的，人性是天赐的。仁爱之心是人的本性，也是天命，遵循人的这种本性行事就合乎天道。以此作为道德观，就是养性或养气，孟子自己的体验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作为政治观就是遵循人性以行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引文均自《孟子·公孙丑》)。

说到底，君和民都是天所生，天之子。立君是为了养民，没有民哪有君？哪有社稷？所以孟子又提出一个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

汉代推动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把孔孟的政治观归结为：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立王以为民也。其德足以安
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

儒学在战国时即称“显学”，汉初虽号行黄老之术，但在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求长治久安之策时，朝廷采纳的仍然是陆贾、贾谊等儒生的仁政观点。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被志士仁人奉为圭臬，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在他们眼里，忠君是辅君以德，致君尧舜，使社会安定和谐，万民欢庆，忠君和爱民是统一的。而助君为恶，残害人民的则是奸佞，是乱臣，他们的善良本性已被金钱美色、名誉地位等外物所铄，异化为“非人”了。正人君子应该和这些异类划

清界线，加以铲除，铲除不掉，只有自重自爱，退避而去。这些杰出人物的代表如汉之肖何、曹参，唐之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明君奠定汉唐盛世基础，建立千秋功业。纵使遭逢国运已衰，甚至生当季世乱世，也出现了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存仁”“取义”，以身殉国的文天祥……等等，虽功业未成，慷慨悲歌，但其精神与日月同辉，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至于本书所辑的那些出现在盛世、衰世、或者季世乱世的廉洁清正之士的言行，无不是明道守正，严于律己，持身俭约，为民请命，也是维系我们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而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过是一堆社会垃圾。可怕的是在他们东窗事发，名裂身亡以后，还要霉烂发臭，滋生出细菌来，继续成为社会公害。今之贪污腐败分子，就是这些亡灵滋生出的社会公害。

四

贪污腐败既然是与阶级社会共生的产物，不管先哲和贤明君主们如何劳心苦思，探寻出多么完善的倡廉反贪措施及其理论根据，因其终极目的在于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产生贪污腐败的社会根基，即社会存在阶级，政权又掌握在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手中。虽可短暂截流，源头仍在，贪污腐败的浊流秽水就不得终止，甚至在一定时候会泛滥成灾。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以后，问题才

可望得到根本的解决。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准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不要借助于天命天道,而是科学地总结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指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人,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通过建立建全社会主义制度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和消除两极分化,走全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终实现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大同世界构想美满得多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共产党在长达七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许多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贪污腐败现象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相容之处。但是,我们毕竟是从阶级社会走过来的,剥削阶级的腐朽僵尸所发出的臭气尚未散尽;我们又要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相互交往,也难免要带来一些消极因素。由此,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个别或少数不坚定分子,腐化堕落乃致走上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的犯罪道路是不足为怪的。

问题不在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内部是否会出现贪污腐败现象,问题在于党和政府是如何对待这些现象,重视的程度如何,防止和消除这些现象的措施是否有力。

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党以来,就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不是“爱民如子”,而是把人民群众视为“衣食父母”,同甘苦共患难。所建立的人民军队,手中的枪是用来帮助贫苦农民翻身解放,建立和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对士兵实行官兵平等,对人民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缔造军民鱼水情。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人民政权,手中的权是用来组织人民保卫翻身解放得来的胜利果实,支援子弟兵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共产党和人民政权采取了许多防止脱

离群众和滥用权力的措施,不断加强廉政建设。如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待遇一律为供给制,不给党的领导人做寿,等等。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透辟地分析了全国胜利即将来临,党的工作中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新形势,号召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以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团结各族人民,镇压了国民党残余和地主恶霸相勾结所进行的土匪暴乱,抑制和克服了被视为国民党政府顽疾的通货膨胀,打击了不法奸商的投机倒把,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禁绝了贩毒、吸毒、卖淫、嫖娼、聚赌等社会丑恶现象,在短短的三年左右时间,便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实现了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廉明政治。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政权巩固、共产党威望崇高这个铁的事实。

中国各族人民一致把共产党视为慈爱的母亲,齐声歌颂她的光荣、伟大,固然主要由于我们党能够在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积累经验,纠正错误,做到理论和实践高度统一,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党员公而忘私、忍辱负重的高尚情操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行动在他(或她)们周围群众中形成的凝聚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党的一大批干部,尤其是中央的高层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不是胸怀坦荡、作风朴实,生活俭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如日月中天,不仅是垂范当世的一代伟人,而且足以垂范百代。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遗余力地反对贪污腐败。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一经查觉贪污腐败,就严惩不贷。早在革命战争时期,

1933年,毛泽东同志就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主席名义颁发过《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又颁发过《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随后各解放区相继颁发了类似条例,这对纯洁党的组织,挽救一些对共产主义事业不够坚定的干部,保障革命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财经纪律、惩治贪污浪费、防止干部享受特权等律令法规,成立了各级监察委员会监督执行。使我党继续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保持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十七年建设道路上克服了帝国主义封锁、某邻国背信弃义和我们因缺乏经验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等障碍,使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国际威望有很大提高。

文化革命的“十年内乱”,虽然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进程,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纪律,搞乱了党员的思想,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在一些干部中滋生了腐败现象。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建设进程和党风党纪得以迅速恢复。

198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起步的年头,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党风建设。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陈云同志在中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1982年,党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指出:“在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进行这场坚持共产主义纯洁性、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设。”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顺应党心、民心的坚定举措。

近来，举国上下关心政治的空气有所加强，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困难厂矿和边远山区访贫问苦以身垂范，成批干部下到农村包干扶贫，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演出，各种传播工具端正方向，文艺影视作品提高格调，各行各业努力纠正只顾捞钱不顾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罚劣打假，扫黄禁毒，惩治贪污腐败，打击刑事犯罪，都证明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正在有力地贯彻执行，“两手抓”的方针正在落到实处。我深信，照此发展下去，并且随着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两极分化的现象得到遏制，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长期坚持惩治并最后消灭贪污腐败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贪倡廉不仅对于维系党心民心，保障社会安定团结，甚至事关国家盛衰、党的存亡的重要性愈加显露，而且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愈加明晰，同时也愈加证明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综合治理的深刻含意。四川辞书出版社领导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筹划出版本书以为这项系统工程中的一块基石。一经提出，便以宏扬主旋律的鲜明特征，获得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和省委宣传部的首肯而列入 1997 年省的重点选题和“五个一”工程计划。

本书以“史鉴事典”为名，史者迹也，典者经也，历代史家对事之真伪必以可靠文献为依据，人之臧否必以隔代定论为准绳。故本书所辑上起春秋战国，下迄 1949 年前的中华民国。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史事，二是名人言论，三是律令法规。史事以人为主体的，按时序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先列廉，后列贪。我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尤其是昏主贪官多如牛毛，不能尽列，只能择其事迹突出